

論粵語源流研究的三個核心問題

侯興泉

暨南大學華文學院 數智華文重點實驗室

thouxingquan@jnu.edu.cn

提 要 論文主要從粵語的形成機制、流播方式以及支撐材料三個維度，對粵語源流研究中爭議最大的幾個核心問題加以梳理和總結，並予以簡單的評述。

關鍵詞 粵語史；形成機制；流播方式；共時語音；歷史文獻

粵語源流的考證研究一直是學術界關心的問題，同時也是爭議較大的難點問題。一些地方政府的宣傳部門基於文旅方面的考慮，也很重視粵語起源地的相關研究和宣傳，都希望在其管轄的地區率先擁有話語權，以便提高該地區在粵語族群中的影響力。由於學術界在該問題上還有許多爭議，導致許多不明就裏的網民在看到網絡上的一些帶有明顯宣傳性的主觀論斷後，紛紛打起了嘴仗，一些帶有明顯地區對立的言論也陸續出現。要想從根本上解決粵語源流問題的爭議，還是要回歸學術本身，圍繞其中的核心問題，從學理上加以闡明，以正視聽。本文將從粵語的形成機制、流播方式以及研究粵語源流的支撐材料三個維度，對學界爭議最大的幾個核心問題加以梳理和總結，並予以簡單的評述。

壹 形成機制

一、譜系分化還是接觸融合？

李如龍（2001:16-17）認為形成漢語方言的主要原因是社會的分離、人民的遷徙、地理的阻隔、民族的融合和語言的接觸。概括起來主要是譜系分化和接觸融合兩大類型：社會的分離、人民的遷徙和地理的阻隔是單一語言譜系分化的主要原因，而民族的融合和語言的接觸則一定會伴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語言或方言相互之間的整合。

傳統方言學界對各地漢語方言的形成主要秉持的理念是歷史語言學中常說的

譜系分化機制，即講原始漢語的人口集體遷移到某地之後，由於歷史久遠、地理隔絕等原因發生了分化，從而形成了各地的方言。這種理念以國內方言學界最有影響的一部教材《漢語方言學概論》（袁家驊等著，1983）為代表，在千禧年以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起着主導性的地位。也正因為如此，當李敬忠（1990）從語言接觸和融合的角度來討論粵語的形成時，很快就遭到學界較多的批評。與之相對，從漢人南遷譜系分化的角度來論證粵語起源的代表學者是葉國泉和羅康寧（1995），他們認為：

“由於廣信一帶遠離中原，交通不便，這些漢族移民進入嶺南之後，他們使用的漢語也就逐漸偏離了中原漢語的發展軌跡而形成了自己的某些特點，遂形成了早期的粵語，即粵語的雛形。”

其實葉、羅有關粵語形成的論述推論性比李文更強，幾乎沒有語言學層面的有效論證，但由於其觀點符合當時學界的主流認知，故其影響要比李文大。

進入千禧年以後，鄧曉華（2004）和潘悟雲（2004、2009）兩位學者主要從語言之間的相互接觸和融合的角度來解釋南方漢語方言的形成。其實從接觸和融合的角度來討論方言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從討論粵語的形成發端的。如李敬忠（1990）就認為粵語主要是在秦、漢兩個王朝派遣大軍征服南越為先導這樣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使數百萬“華夏人”陸續擁向嶺南，與當地土著民族相互交融而逐漸發展形成的。李新魁等（1995：8-11）認為：

“促使粵方言的出現和形成，首先的不是秦時的大規模的移民，而是楚方言流傳、擴散的結果……隨着楚人的進入廣東，也就發生了楚方言與土著民族（如壯族語言）的交融過程。”

李錦芳（2000）也認為：

“粵語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之一是嶺南地區曾經出現的戰國至唐宋歷時千餘年的雙語現象……粵方言的形成可能是通過廣州附近的漢、越兩族人民長時期的採用漢越雙語後，越族人民放棄母語轉用漢語而實現的，但是這時廣州一帶的漢語（唐宋時期）已經融入了相當的百越語言成份，因而形成一支獨特的漢語方言。”

侯興泉（2006）在討論廣東封開粵語羅董話幫端精三組聲母老派讀音時也從語言接觸並換用的角度提出了一個有關羅董話形成的假設，認為：

“羅董的原住民主體是古壯侗民族居民，他們在漢族先進的政治、文化和經濟的影響下學習漢語並形成一種帶有本族母語特徵的僵化的中介語，而

南來的漢語也受到當地這種僵化的中介語的干擾，語言特徵上跟它越來越接近；後來土著由於種種原因放棄了自己的母語轉用漢語，土著使用的這種僵化的中介語跟當地的漢語一起逐漸地演變成今天的羅董話。”

麥耘（2009）則持一種綜合性的意見，他總結粵語類型的方言形成的歷史軌跡是譜系樹模式與地理類型學模式的揉合：它在大模樣上近似樹狀，而細節上則往往呈網狀，是珠江三角洲水網狀。

筆者以為，現在越來越多的證據指向粵語的形成機制跟南下漢語與當地土著百越語之間的接觸與融合密不可分，只是這種接觸融合的強度、深度以及具體細節如何，以致剛形成時期的原始粵語究竟有何重要的、足以跟其他漢語方言區分開來的特徵，這些問題仍需今後進一步開展深入的研究。

二、單地起源還是多地起源？

關於粵語的起源地是單一源頭還是多個源頭，學術界也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單一源頭說以葉國泉和羅康寧兩位學者為代表，他們在《粵語源流考》（1995）中明確指出，粵語形成於西江中部。文中的“西江中部”所指，正是以古廣信（今封開）為中心的一片地區。這篇文章主要是運用移民、考古、文化思想等歷史文獻來論證粵語的形成和發展的，很可惜裏面沒有運用粵語自身的材料去論證。後來羅康寧（1996、1998）似乎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隨後發表的兩篇文章中都有意地加入語音方面的材料論證。李連進（2005）在討論勾漏片粵語歸屬的時候指出勾漏片方言、平話和土話是一種方言，並且認為它們應該存在過權威代表方言，而這個古代南方方言的權威代表點應是當時的廣信話。文章指出：

“當時作為嶺南首府語言的廣信話是一種源頭性的權威性代表方言，它憑藉其政治、文化、經濟、交通諸優勢，以當時最為重要的幾條江河交通路線為途徑向今兩廣、海南、湘南、越南等廣大地域擴散、幅射，形成了今平話、土話，勾漏片等方言。”

儘管李文的核心觀點並不認為勾漏片粵語屬粵語，但其學術理念上還是認為嶺南地區的勾漏片粵語、平話和土話是有一個共同的源頭的，並且其發源地就在漢代的廣信一帶。

秉持粵語形成地是多源的代表學者是甘于恩和他的學生吳芳，他們在《論粵語形成的多源性》（2007、2008）一文中對葉、羅（1995）的論文進行了全面的反駁性回應。他們質疑葉、羅兩位先生的觀點缺乏充份的事實根據和嚴謹的論證，並從“何為粵語”以及史料的辨析兩個角度予以反駁。他們從粵語的共時差異的

角度認為：

“作為漢語方言的粵語並非形成於一個特定的時期，而是隨着不同時期的漢族移民進入，逐漸形成的”，“由於廣府文化的權威性，各地粵語形成後，有慢慢向廣府粵語靠攏的趨勢”。

要討論一個語言或方言的起源地究竟是一個區域還是多個區域，這個難度看來比討論語言的形成機制還要困難。如要論證粵語起源於某個單一地區，則必須論證粵語剛形成時是甚麼樣子的，為甚麼當時只能形成於該地而不是別的地方，它形成以後又是如何擴散到嶺南各地乃至海外，形成今天各地同中有異的粵語次方言的。而若要認為粵語起源於多地，則同樣要解釋清楚各地剛形成時的粵語是甚麼樣子的？各地各有差異的粵語後來是如何被各地的人民認可，覺得它們都屬同一種方言的？也就是說單一起源地假設最重要的是要解釋清楚粵語形成以後的流變問題，而多源地假設最重要的是要解釋形成之後的聚合問題。

三、形成的具體年代

語言史研究最困難的一件事情是要給一個缺乏文獻記錄的語言或方言的形成時間做一個判定。目前學界有關粵語形成的時間判斷大體有以下幾類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

（一）秦末至東漢。葉國泉、羅康寧（1995）認為：

“從秦至東漢這段漫長的歲月，西江中部一直是嶺南漢族移民的主要地帶。這些漢族移民將中原的文化、語言帶到這裏，生根，開花，結果，是經歷過一段漫長的道路的……語言是文化的載體，隨着漢族文化的傳播，漢語也就在這一帶流行開來。由於廣信一帶遠離中原，交通不便，這些漢族移民進入嶺南之後，他們使用的漢語也就逐漸偏離了中原漢語的發展軌跡而形成了自己的某些特點，遂形成了早期的粵語，即粵語的雛形。”

（二）秦至晉。李新魁等（1995:18-19）認為：

“由秦至晉，這一趨勢不斷有所加強。由於廣州地區居民來源駁雜不一，語言上也發生了融合……雜居的結果，是語言的進一步融合，融合的結果是產生了一支更接近中原漢語但又比較特殊的方言——粵方言”。

（三）晚唐五代。以麥耘（1993、1997、2009）和王洪君（2009）為代表。麥耘（2009）認為：

“唐後期以前的嶺南漢語與中原漢語差別有限，只是中原漢語在嶺南的一個次方言，而南漢以後，粵語就與中原漢語拉開距離，成為獨立的大方言

了。從另一個角度說，這次以唐後期傳播到嶺南來的中原漢語為主體的聚變，把此前的嶺南漢語的面貌、它的歷史演變痕跡基本上抹掉了，或者說把它早期的譜系綫索淹埋了”。

王洪君（2009）認為：

“粵方言與晚唐五代通語（•B III）共享如下晚於《切韻》的創新特徵：重韻合流、三四等韻合流、非敷奉擦音化而微母保持鼻音；但又與下一階宋代北方通語（•B IV）有如下不同：次濁上不歸清上而歸陽上、全濁聲母不是平送仄不送而是平上送去入不送、入聲保留 -p、-t、-k 韻尾。”

並以此判定粵語形成的時間當在晚唐五代。

（四）宋末。劉鎮發（2000）首先否認了現代粵語跟古代粵語之間的繼承關係，他認為流行於珠江三角洲、西江流域和廣東西部大部份地區的“現代粵語”源於宋末移民，並列舉了聲韻調以及詞彙上的諸多證據作為佐證。

整體來說，第一種和第二種觀點假設性太強，而且沒能拿出比較讓人信服的語言學證據。第四種觀點又過於極端，雖然宋末從粵北南遷到珠三角的移民會對當時嶺南地區業已存在的語言或方言造成很大的衝擊，但認為這種衝擊大到足以覆蓋原來的方言這明顯過於極端，這從現在佛山地區的粵語語音中仍然保留較多的勾漏片粵語底層就可見一斑（詳見陳衛強、侯興泉，2016）。再者，從後來許多學者所做關於兩廣境內粵語和平話的比較研究來看，廣東西部粵語及廣西境內的平話、勾漏片粵語跟劉鎮發（2000）所言的現代粵語無論是在音系層面還是詞彙層面都是大同小異的。就目前學界對粵語形成時間的探討來說，粵語形成於晚唐五代的觀點整體而言還是比較有道理的。

貳 流播方式

方言的流播方向跟移民的類型和方式有密切的關係。周振鶴、游汝杰（1986:27-37）討論了六種移民方式和方言地理分佈的關係：1. 佔據式移民和方言內部大面積的一致性；2. 墨漬式移民和蛙跳型方言傳布方式；3. 蔓延式移民和漸變型方言；4. 雜居式移民和摻雜型方言；5. 閉鎖型移民社會和孤島式方言；6. 板塊轉移式移民和相似型方言。李如龍（2001:22-24）將方言的流播方式歸納為延伸型、穿插型和填充型三類。

學界有關粵語流播方式的討論也有不少，大體也囊括了李如龍所提及的三種

類型。葉國泉、羅康寧（1995）認為粵語秦末東漢期間在西江中游一帶形成之後，進一步隨着時代的發展而變化，具體表現為：

“番禺成為州治之後，漢人的勢力便向西江下游及珠江三角洲擴展……在這種良好的條件下，漢族的文化及語言就從西江中游不斷地向東傳播，粵語便逐漸成為西江流域至珠江三角洲一帶的通行語言。”

覃小航（1998）指出廣西西部粵語主要呈綫狀分佈，具體的分佈特點是沿江而布，主要呈兩條分佈綫：一條是從東到西的分佈綫，即以桂平江岸為起點，經鬱江、邕江、至百色。另一條是從東到南的分佈綫，即以桂平江岸為起點，經鬱江、邕江，然後在邕江向南掉頭，經左江直至越南北部。他認為廣西西部粵語呈綫狀分佈的原因是東部粵人（呈塊狀分佈）沿江西遷的結果。李錦芳（2000）認為粵語可能自唐代形成起就比較有效地向西擴散，一千多年來逐漸擴散到粵西、桂東、桂東南和桂西，具體可細分為宋至元明、明代至清中葉、清末至民國三個時期。李錦芳之文指出：粵語西擴的每個階段都伴隨着跟壯侗語的接觸，其中前兩個階段是大量粵語區自發移民形成大片的城鄉漢越雜居狀態，經過長期的城鄉漢越語言接觸，形成今天粵西桂東成片的廣府粵語區。第三階段則主要因廣東商人的到來而形成，粵壯語言的接觸僅發生在部份城鎮（當然也會波及附近的農村）。麥耘（2009）認為粵語自形成後也存在中心區域對邊緣區域的擴散，其中邕潯片粵語的形成是粵語廣府片沿西江上游不斷擴散的結果，高陽片的形成主要是本地原住民習得廣府片粵語而摻入自己的成份後形成的，惠州話的形成則涉及粵語和客家方言兩種漢語方言的交融，廣西東北部的鍾山方言是古代嶺南漢語或粵語接受湘語的部份疊置、覆蓋而形成的，而粵北地區的粵語的流播方式則比較特殊，存在多種擴散類型。

整體而言討論粵語流播方式的論文前期假設性較強，後來的研究又多局限在某個具體的區域。統攝全域的粵語流播方向研究仍有待進一步加強，特別是有關粵語在海外的流播方式的討論還很少，是今後粵語研究需努力的方向之一。

叁 支撐材料

討論粵語的源流問題，最重要的證據首先是粵語自身的證據，其次是不同歷史時期文獻上記錄粵語的相關文字，最後才是跟粵語的形成和發展緊密相關的移民、歷史、地理、軍事和政治等相關的一些重要事件或要素。下面我們重點談談

語言和文獻這兩類材料在粵語史研究中的運用情況並簡要分析其各自的利弊。

一、粵語自身的語言材料

目前方言學界對共時分佈的各類粵語點的調查材料已經很豐富了，尤其是字音材料，基本上已經囊括了目前已知的大部份粵方言點的素材。利用共時的語音材料做粵語聲韻調的歷時比較，這類成果是很多的，但凡討論粵語音韻特徵的論文多少都會涉及一些。可是系統討論原始粵語語音系統的成果却不多，相關代表性研究如 John McCoy (1966)、辻伸久 (1980)、余靄芹 (2000)、Huang (2009)、侯興泉 (2016) 等。

以上研究基本上都屬利用局部材料對粵語語音系統內部某個子系統的構擬，McCoy (1966) 只利用的四邑片粵語的材料，辻伸久 (1980) 只是利用當時廣西境內 8 個粵語點的材料，余靄芹 (2000a, 2006) 討論了原始粵語的聲調和聲母系統，Huang (2009) 則討論了原始粵語的元音系統，侯興泉 (2016) 主要通過比較討論了西部粵語的聲韻調演化問題，因此都還不能完整地描寫出原始粵語的語音全貌，仍需進一步展開全面深入的研究。

二、文獻材料

以往方言學界研究粵語史主要關注的文獻有兩大類：一是海外傳教士和漢學家編寫的教科書、詞典、《聖經》譯本，二是國人編著的韻書、小說、歌冊、戲文、辭書、方誌等文獻。這些文獻大多都是正式出版的專著、教材或文集，伍巍 (2023) 輯錄出版了 17 卷共 23 部此類的粵方言文獻。有學者利用同一種粵方言不同時期的文獻或將文獻與當代方言進行對比，探討歷時的語音演變研究，如張洪年 (2000)、羅言發 (2022) 和侯興泉 (2023)。更多的學者則利用這些材料開展粵語詞彙史和語法史的研究，代表性成果如余靄芹 (2000b, Yue 1997、2001)、張洪年 (2009, Cheung 1997、2001)、陳萬成 (1994)、錢志安和鄒嘉彥 (2005)、歐陽偉豪 (2004)、郭必之 (2003、2005)、楊敬宇 (2006)、金貴桃 (2016、2018)、金桂桃、劉暢 (2017) 等。

方言學界對嶺南地區 (含越南北部) 廣泛流傳的民間文獻關注不足，這些民間文獻主要有族譜、碑刻、僑批、宗教科儀書、唱本劇本、賬本、書信、日記、醫藥書、堪輿書、日用雜字和各類契約及訴論文書等，其中尤以日用雜字、唱本劇本、宗教科儀書、僑批和文書等資料中的方言材料最為豐富。今後可充份收集和整理以上類別的民間文獻，並展開嶺南方言歷史和地理流播的相關研究。

肆 結語

粵語的起源問題在最近的 2、3 十年中不僅受到學術界的熱切關注，更牽動着萬千廣府人的神經。互聯網興起以來，特別是新媒體出現後，許多粵方言和粵文化愛好者乃至地方政府都加入到了對該問題的討論和宣傳當中。討論粵語的起源問題首先要弄清楚其形成機制，目前學術界更傾向於認為粵語的形成是南來漢語與嶺南土著語言接觸和融合的產物，比較可靠的形成年代大概是在晚唐五代。至於粵語最初是在單一區域形成然後再擴散到各地，還是多地形成後通過接觸再形成一個個的粵語次方言，該問題仍值得今後進一步探究。討論粵語的源流問題，離不開可靠的語言證據和相關的歷史文獻材料，目前學界對粵語的共時調查成果以及正式出版的文獻材料關注較多，對散落在各地的非正式出版的民間文獻重視不夠。

參考文獻

- 陳衛強、侯興泉 2016 佛山粵語中的勾漏片語音層，《方言》第 2 期，197-200 頁
- 陳萬成 1994 近代粵語反覆問句的演變及有關問題，《第一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現代教育出版社
- 鄧小華 2004 試論古南方漢語的形成，《語言接觸論集》，上海教育出版社
- 甘于恩 2007 論粵語形成的多源性，第四屆土話平話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賀州）
- 郭必之 2003 香港粵語疑問代詞“點[tim35]”的來源，《語言學論叢》第 27 輯，69-78 頁
- 郭必之 2005 香港粵語能性述補結構發展的幾點觀察，《第九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271-277 頁，澳門：澳門中國語文學會
- 侯興泉 2006 廣東封開羅董話幫端精三組聲母老派讀音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侯興泉 2016 《粵語勾漏片封開建話語音研究——兼與勾漏片粵語及桂南平話的比較研究》，中西書局
- 侯興泉 2023 從兩種文獻看清末順德粵方言的音韻特點，第三屆古代方誌文獻與現代語言研究高峰論壇
- 金桂桃 2016 近兩百年廣州話“乜”系疑問形式的發展，《方言》第 4 期，401-409 頁
- 金桂桃 2018 19 世紀以來廣州話完成體標記“了”“曉”“咗”的發展，《勵耘語言學刊》第 2 期，342-354 頁
- 金桂桃、劉暢 2017 19 世紀以來廣州方言選擇疑問句的發展，《中國語文》第 5 期，582-588+639 頁
- 李錦芳 2000 粵語西漸及與壯侗語接觸的過程，《第七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方言》增刊），商務印書館
- 李敬忠 1990 粵語是漢語族群中的獨立語言，《學術論壇》，第 1 期，54-62
- 李連進 2005 勾漏片的方言歸屬，《民族語文》第 1 期，34-41 頁

- 李如龍 2001 《漢語方言學》，高等教育出版社
- 李新魁、黃家教、施其生、麥耘、陳定芳 1995 《廣州方言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
- 劉鎮發 2000 現代粵語源於宋末移民說，《第七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方言》增刊），商務印書館
- 羅康寧 1996 封川話濁塞音聲母初探，《嶺南文史》（封開文史專號）第 4 期，35-36 頁
- 羅康寧 1998 粵語起源地新探，《西江大學學報》第 2 期，28-32 頁
- 羅言發 2022 《澳門話近兩百年來的音變》，清華大學出版社
- 麥耘 1997 中古精組字在粵語諸次方言的不同讀法及其歷史涵義，《中國語言學報》（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第 2 期，211-226 頁
- 麥耘 2009 從粵語的形成和發展看漢語方言形成的模式，《方言》第 3 期，219-232 頁
- 麥耘 1993 粵語是漢語的一支方言，《語文建設通訊》第 41 期，65-72，38 頁
- 歐陽偉豪 2004 粵語起始助詞的研究，《丁邦新教授榮休紀念論文集》，164-201。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中國語言研究中心
- 潘悟雲 2004 語言接觸與漢語南方方言的形成，《語言接觸論集》，上海教育出版社
- 潘悟雲 2009 吳語形成的歷史背景——兼論漢語南部方言的形成模式，《方言》第 3 期，193-203 頁
- 錢志安、鄒嘉彥 2005 粵語“俾”字句的語法演變過程初探，《第九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302-311，澳門中國語文學會
- 覃小航 1998 廣西粵語的綫性分佈和歷史成因，《中南民族學院學報》第 1 期，122-124 頁
- 王洪君 2009 兼顧演變、推平和層次的漢語方言歷史關係模型，《方言》第 3 期，204-218 頁
- 吳芳、甘于恩 2008 粵語多源論，《廣西民族研究》第 2 期，106-111 頁
- 伍巍 2023 《近代漢語粵方言文獻集成》，商務印書館
- 楊敬宇 2006 《清末粵方言語法及其發展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
- 葉國泉、羅康寧 1995 粵語源流考，《語言研究》第 1 期，156-160 頁
- 余靄芹 2000a 粵音構擬之一：聲調，《中文學刊》第 2 期，227-241 頁
- 余靄芹 2006 粵音構擬之二：聲母，《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語言暨語言學》專刊，外編之 6），75-170 頁，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余靄芹 2000b 粵語方言的歷史研究——讀《麥仕治廣州俗語〈書經〉解義》，《中國語文》第 6 期，497-507 頁
- 袁家驊等 1983 《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
- 張洪年 2000 早期粵語中的變調現象，《方言》第 4 期：299-312 頁
- 張洪年 2009 Cantonese Made Easy: 早期粵語中的語氣助詞，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2.
- 周振鶴、游汝杰 1986 《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 Cheung, Hung-nin Samuel (張洪年). 1997. Completing the complete: (Re)constructing early Cantonese gramma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yntax, 133-165.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10.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 Cheung, Hung-nin Samuel (張洪年). 2001. The interrogative 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ng early Cantonese grammar. Sinitic Grammar: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191-23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Karen. 2009. A Reconstruction of Proto-Yue Vowels.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Vol. 40(2): 3-20.
- McCoy, W. John Jr. 1966. Szeyap Data for a First Approximation of Proto-Cantonese[D]. Cornell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Tsuji, Nobuhisa (辻伸久). 1980.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Guangxi Yue Dialects. Tokyo: Kazama Shobo.

Yue(-Hashimoto), Anne O. (余靄芹). 1997. Syntactic change in progress part I: Th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in Hong Kong Cantonese. 《橋本萬太郎紀念中國語學論集》, 329-375 頁, 內山書店

Yue(-Hashimoto), Anne O. (余靄芹). 2001. The verb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antonese. *Sinitic Grammar: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232-26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Three Core Issues in the Study of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Yue Dialects

HOU Xingqu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Jinan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houxingquan@jnu.edu.cn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the most controversial core issues in the study of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Yue dialects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formation mechanism, spreading mode and supporting materials, and gives a brief review.

Keywords: History of Cantonese, formation mechanism, spreading mode, synchronic phonology, historical literature